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特 稿〉

民主作為一種志業：向 Juan Linz (1926-2013) 致敬 陳方隅 1

〈長篇書評〉

閱讀魯迅的三個視角 林峻煒 7

竹內好 從「絕望」開始

伊藤虎丸 魯迅與終末論

汪 晉 聲之善惡：魯迅《破惡聲論》《呐喊·自序》講稿

〈短篇書評〉

Christopher J. Losers' Consent: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巫俊穎 18

Anderson ... [et al.]

劉高登(Gordon Laird) 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 周雅薇 23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一四年二月
第四十期



資深編輯顧問	王業立、石之瑜
編 輯 顧 問	陳亮宇
主 編	蕭育和
執 行 編 輯	嚴博瀚
編 輯 委 員	王欽、江俊宜、邱士杰、陳方隅、陳瑋鴻、廖斌州 魏龍達、蘇慶軒
發 行 單 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民主作為一種志業： 向 Juan Linz (1926-2013) 致敬

陳方隅 /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所
博士班

一、其人、其事及其研究

耶魯大學榮譽教授 Juan Linz (中譯常譯為胡安·林茲) 於 2013 年 10 月與世長辭，享壽 86 歲，本刊謹以此文向大師致敬。

Linz 於 1926 年出生於德國，雙親皆為西班牙人，他終生皆以西班牙公民身份為榮 (Tucker, 2013)。自馬德里大學以優秀成績畢業後，前往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師承 Martin Seymour Lipset，並獲社會學博士學位。1961 年起主要任職於耶魯大學，同時也在歐洲各地講學及研究。從博士論文寫作時，他就展現出「百科全書式」的特色，往後無論是研究或教學，都相當具有個人風格。Linz 桃李滿天下，指導或共同指導的博士論文就有 65 篇；學術生涯獲獎無數，包括 1996 年時獲得有政治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the Johan Skytte Prize (Tucker, 2013)。

許多 Linz 的學生對其教學方式及其人其事有精彩的描述，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陳健民教授 (2007; 2013) 以及台灣大學社會系林國明教授 (2013)。以下這段文字生動描繪了大師獨有的風範，令人神往：「他的存在給了你動力。……如果老師的角色像知識旅程的嚮導，一般研究所的討

論課，就是由嚮導帶你到每個必遊景點走馬看花。Linz 的課不是這樣。他給你一張很大很詳盡的地圖，你可以自己找幾個景點去深度旅遊。……將他畢生研究非民主體制和民主化的知識，在課堂上傾囊相授。但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Linz 的課當真是如此。」(林國明，2013)

Linz 的學術關懷主要在於民主化與民主鞏固，他從研究其母國西班牙的民主轉型開始，其中包括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他著重討論非民主政體的特性，解釋不同的非民主政體異同以及發生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不同途徑，並且探討有利於民主鞏固的制度設計等面向。其主要教授的課程：「比較威權與極權政體」、「民主轉型」和「穩定民主體制的社會與政治條件」，正是其畢生的研究菁華 (林國明，2013)。¹ 以下將以這個順序回顧其研究。

二、非民主政體的特性與分類

Linz 最為人所熟知的學術貢獻之一是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與定義 (Tucker, 2013)。「民主化」是指一個國家從「非民主政體」轉變為「民主政體」的過程，討論非民主政體的特性即為民主化的「起點」。政體的區分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民主與非民主的運作模式，不同類型的政體具有不

¹ 林國明 (2013) 文章中除了對 Linz 上課狀況有精彩描述外，亦對 Linz 的學術貢獻做出分類、簡介與評論，本文參考及借用該文的順序及分類，並綜合筆者剛進入博班時修習「比較政治」的第二個作業——閱讀及分析 Linz and Stepan 一書的論點，其中主要討論以下三點當中的前兩點。

同的特性（特別是公民社會的發展情形），這將影響到民主化及民主鞏固的發展途徑（詳見下段討論）。

Linz 於 1964 年以西班牙為原型，討論威權政體的運作模式；他於 1975 年以長達 227 頁的篇幅，在政治科學手冊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撰寫了討論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定義的專章。² Linz 從官方意識型態、領導方式、動員程度和政治社會多元性等面向，在非民主政體當中區分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典型的威權政體包括西班牙及南美洲的軍政府。³ 隨著政治局勢的發展，Linz 進一步分類不同的政體型態，其中包括後極權政體 (post-totalitarianism)⁴、蘇丹式政體 (Sultanism)，「後極權政體」概念更被廣泛運用在中國研究及其他後共產國家。

Linz 對這些威權政體次類型的定

² 這篇題為〈極權與威權政體〉(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的專章，於 2000 年擴充成書出版。

³ 與極權政體相比，威權政體已出現有限的政治及社會多元性，但並不具有「責任政治」的特質；沒有一個官定的意識型態，僅有某些特別的理念；大規模或密集的群眾動員已較少見；由一個領袖，或者一個小集團行使權力；其權力的行使沒有一套清楚規則，但已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 (Linz, 2000)。

⁴ 主要在某些共產國家，政治及經濟轉型後，官方意識型態仍存在但已淡化，相對自主的公民社會萌芽，動員程度降低，政治權力出現黨內的制度化，技術官僚進入領導階級。和威權政體相比，後極權政體仍然具有維持滲入社會深層的統治機制（例如中國共產黨在所有公司行號、學校、各級政府機關都還保有黨組織），且維持官方意識型態，因此並不能稱為威權政體的次類型。即高度個人化、王朝化、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體 (Linz and Stepan, 1996)。

義幾乎已成典範，許多研究往往採取其原型，再發展出更細緻的操作化定義。學者們也根據各國狀況，再發展出不同的政體概念，例如競爭式威權政體。⁵

在研究非民主政體的同時，Linz 也從社會學角度深入研究極權主義（尤其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動員模式、社會基礎等 (1980)，並且討論不同政體的轉型途徑以及制度設計 (1978)。⁶ 從各研究主題來看，其研究取向較接近「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和方法，強調「多重的因果關係分析」（林國明，2013）。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將研究內容簡單區分成政體類型、民主化、憲政體制等，但它們彼此其實都是高度相關。

三、民主鞏固

從「非民主政體」轉變為「民主政體」是民主化，而相反的過程則為民主崩潰。Linz 與 Alfred Stepan 於 1978 年就曾合編四卷本的皇皇巨作《民主政體的崩潰》(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並在 1996 年出版《民主轉型與鞏固的種種問題》(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一書，其中對於「民

⁵ 請參閱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2002 年 4 月，其中有一系列討論。2013 年 4 月，Linz 與 Stepan 針對阿拉伯之春的發展，提出一個新的政體型式：威權 - 民主混合政體 (authoritarian-democratic hybrid)，可惜未能有機會繼續闡述其中的運作模式。

⁶ 其對於憲政體制的討論（總統制的危害）早在 1970 年代末期就已提出。從陳健民 (2007)、林國明 (2013) 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Linz 總是有大量的未出版研究手稿供修課學生閱讀。從這邊更可見識其令人敬佩的研究能量與知識產出。

「主鞏固」的概念不僅成為教書科標準定義，更提供了一系列檢視指標。兩位作者認為，在民主化之後，要達成民主鞏固必須在三個層面讓民主成為「唯一的遊戲規則」：行為層面，沒有任何行動者企圖創造一些非民主的規則；態度層面，社會上絕大多數成員相信，民主制度及程序是解決集體問題最合適的方式；憲政層面，所有行為者都以新體制下的法令程序與制度設計解決衝突。他們同時提出，一個國家必須在五個互相影響的場域（arena）分別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與條件才能民主鞏固：自由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自主的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憲政及依治原則（rule of law）、有效的國家官僚（state apparatus）與制度化的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

Linz 與 Stepan 認為，不同極（威）權政體的國家政治權力的性質，以及國家社會關係（依據前段當中提到的政體分類標準），高度制約了政體的轉型途徑。例如，原本的極權主義國家在民主轉型後很難達成鞏固，因為先前政治社會、經濟社會、公民社會被全面嚴格控制，無法發展出以上的民主鞏固在三個層面與五個場域的條件；而威權政體較可能在轉型後達到鞏固，因為先前已經發展出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公民社會（Linz and Stepan, 1996）。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不將這三個層面、五個場域，以及其他指標視為「民主化」的充分條件（相較於 Lipset 等人的現代化理論提出民主化的「先決條件」。陳健民，2013），而是強調在這些領域發展的彼此互相關連。

除此之外，他們提出，民主鞏固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完整性（stateness）：在一個充滿族群衝突、認同矛盾、國內紛爭的地方，民主鞏固愈困難達成。在本書之前，國家的完整性、民族主義、國內衝突等變數對於民主鞏固的影響似乎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

從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研究途徑典範來看，Linz 偏向歷史制度論的途徑較不重視對特定行為者及其偏好的分析，而是著重特定時空環境以及整體事件脈絡，因此較難發展出一般性的理論（Geddes, 2003 : 205-206）。同時，在不同的場域、層面或指標之間，似乎缺乏明確的定義指標與比較標準。⁷ 因此，若要採用其框架做民主化與鞏固的研究，往往需要進一步討論測量與檢證方式。Linz 的貢獻更多在於提供一個關注制度運作的啟發性（heuristic）框架，為了解決衝突、建立有效的國家運作模式，制度的設計是很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對於本身具有不利民主鞏固因素的政體而言。因此，這就連結到 Linz 所關注的另一個重大議題：民主的運作機制。

四、憲政體制設計

Linz 相當重視制度的研究，尤其關於如何防止新建立的民主政體崩潰（陳健民，2013；林國明，2013）。Linz 於 1978 年出版的民主崩潰研究系列當

⁷ 例如，對於「自主」的公民社會定義與測量的方式，都沒有明確的定義。

中，就已開始討論不同制度對於民主運作的影響，其中最為人知就是他對總統制的負面評價（Hochstetler and Samuels, 2011）。Linz 於 1990 年《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創刊號上發表的〈總統制的危險〉(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一文，更是開啟了憲政體制大辯論。Linz 認為，總統制之下，由於勝者全拿（行政權），總統往往訴諸民粹，形成對抗的政治；民眾對於強人總統的期待，及行政權的掌握，選上後易流於專制獨斷；行政與立法具有雙元民主正當性，不易課責，且缺乏憲政僵局的解決機制，易形成政治危機。

最近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從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美國聯邦政府「關閉」部份的部會超過兩週的時間，放無薪假的公務員約有八十萬人。自從 1976 年以來，美國政府曾出現過 17 次關門的政治危機，主要因素就是總統制運作上的最大難題—行政與立法的僵局，特別是在分立政府出現時更容易發生。Linz 指出，二次大戰後只有美國是成功的總統制案例，其他「移植」此制度的國家皆未能達成民主鞏固。除了美國之外，這類的衝突直接影響了民主鞏固的進程。

許多採取總統制的國家皆採用各種方式來減緩這些缺點，例如有些國家設計了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以換軌機制來解決憲政僵局。Linz 所開啟的辯論讓許多學者針對不同憲政體制選擇對民主化與民主鞏固的作用做出全面性的研究，讓學界更深入地思考：什麼樣的制度設計才能讓民主運

作得更好？

除了憲政體制外，Linz 也很重視其他各方面制度的設計，尤其是為了處理多民族、認同與文化衝突的問題。他認為在國家的完整性(stateness)低的地方，特別需要建立以非多數決原則為基礎的多樣性制度，例如：實行聯邦制，使用比例代表制，允許成立代表少數民族的政黨，在教育及文化方面尊重少數文化等等，如此才能克服困難之處並達成民主鞏固。⁸ Linz 也持續關心民主鞏固後的民主實行品質問題，尤其是在筆耕不輟學術生涯的最後幾年，他持續研究美國的民主與所得不均議題 (Tucker, 2013)，其成果是 2011 年他與 Alfred Stepan 共同發表的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e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文，充份展現出奉獻學術工作及重大民主政治議題的精神。

向大師致敬

Linz 的研究總是引領著政治學界及社會學界的重大發展 (Tucker, 2013)。其終生全心投入學術研究與教學，主要關懷在於追求民主制度更好的實踐。

「一代宗師」Linz 辭世，人們除了反思他所引起討論的種種民主與威

⁸ 關於聯邦制的研究，請參考 Linz (1997)。關於認同與文化衝突的問題，請參考 Stepan, Linz, and Yadav (2011)。2013 年 10 月，國際政治學會 (IPSA) 決議以 Linz 之名設立一個獎項，獎勵 "Decentralization, Multinational and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and Federalism Comparative Research"。參閱 IPSA 官網。

權相關議題之外，更可以重新檢視學術與現實世界的連結。最後，本文引用 Linz 學生的話作結，向大師致敬(林國明，2013)：

他的治學態度，教導了學生：社會科學研究必然要建立在深刻的價值關懷，努力為建立更合理的世界尋找可能性。這是從 Linz 身上學到的，以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信念。

參考文獻

- 林國明，2013，〈懷念我的老師 Juan Linz〉。發表於個人網誌，https://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656946707662306。
- 陳健民，2007，〈Juan Linz：其人、其學問——耶魯大學社會學系民主化理論大師〉。《明報》，8/20。轉引自作者個人網誌<http://chankinman.wordpress.com/2007/08/20/>。
- 陳健民，2013，〈在佔中爭議中懷念 Juan Linz〉。《明報》，11/1。
- Hochstetler, Kathryn, and David Samuels. 2011. "Crisis and Rapid Reequilibra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Presidential Challenge and Failure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43(2): 127–145.
- Linz, Juan J. 1978.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J. 1980. "Political space and fascism as a late-comer." In Larsen et al.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Bergen and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53–89.
- Linz, Juan J. 1990.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1): 51–69.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J. 1997. *Democracy, Multi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en Ciencias Sociales, Instituto Juan March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 Linz, Juan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Geddes, Babara. 2003.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reenstein, Fred I.,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1975.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Stepan, Alfred, and Juan J. Linz. 2011.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 Ine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9(4): 841–856.
- Stepan, Alfred, and Juan J. Linz. 2013.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the "Arab Spr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4(2): 15–30.
- Tucker, Joshua. 2013. “Noted Political Scientist, Sociologist Juan Linz Has Died.” *The Washington Post* (online), 10/3.
- Universidad de Alicante, 2013. “Juan J. Linz in Memoriam,” <http://web.ua.es/en/dsoc1/news/juan-j-linz-in-memoriam.html>.

閱讀魯迅的三個視角

林峻煒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書名：從「絕望」開始

作者：竹內好

出版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地：北京

年份：2013

頁數：439 頁

ISBN：9787108043283



書名：魯迅與終末論

作者：伊藤虎丸

出版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地：北京

年份：2008

頁數：403 頁

ISBN：9787108029720



書名：聲之善惡：魯迅《破惡聲論》

《呐喊·自序》講稿

作者：汪暉

出版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地：北京

年份：2013

頁數：212 頁

ISBN：9787108043153

本文將以竹內好、伊藤虎丸與汪暉三人關於魯迅的詮釋為核心，分析三種魯迅詮釋的特色，以及他們如何思考「革命」的意涵與實踐的問題。筆者將指出，竹內好強調魯迅對於日本近代化的批判意義；伊藤虎丸則思考如何從魯迅來反省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的問題；而汪暉則藉由魯迅來說明中國革命的獨特意義。三人的魯迅詮釋雖然不盡相同，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條「從否定到革命」的思考進路，並看到三人如何透過魯迅來面對自身所處的當下及其時代課題。

竹內好：從「無」開始

竹內好的魯迅詮釋，以魯迅的「精神歷史」為核心，因此他反對以編年式的記述來描繪魯迅，而應當理解到，魯迅乃是「行動者」，而其「精神歷史」也體現在其「行動」之中。¹

竹內好注意到，貫穿魯迅一生的是「寂寞」、「絕望」，最具象徵性的感受，即是魯迅面對孫文革命失敗時，「他看到了孫文革命的失敗，也由孫文看到了自身。」孫文革命失敗，使魯迅對現實絕望，但在絕望中，魯迅表達了某種信念：「由於信念的不斷加強，失敗感也便越來越強烈，沒有哪一個文學家像他一樣對現實感到絕望，可也沒有人像他一樣堅定著自

己的信念」，此即為「永遠革命」的信念。雖然如此，但魯迅並未以「面對未來描寫希望」來回應失敗感，相反地，「他總是著眼過去（或者是包括過去的現在），看到其中的黑暗」，並且，「從一開始就背負著過去的沉重包袱出發，所以他發出了想要忘記過去的嘆息。」（頁9）對魯迅而言，「失敗感」映照出「過去」的沉重，但卻也因此企圖「擺脫過去」。魯迅的一生，體現出「信念」與「失敗感」的交錯。

在魯迅所處的時代中，梁啟超有極大的時代影響力。作為「啓蒙者」，梁啟超的「政治小說論」為文學創作賦予政治活力。然而，竹內好認為，即使魯迅受到此種「時代思潮」影響，但我們應該注意魯迅的態度。魯迅留學日本期間，明顯地受到科學知識和啓蒙文學的影響，這同時反映出他受梁啟超的影響，但竹內好卻說：

那種影響可以稱為時代思潮，魯迅當時也受到了影響。不過他的接受方式略有不同，也就是說他有梁啟超所沒有的東西。與梁啟超不具備而康有為所具備的閉塞的宗教不同，與林紓和嚴復相比，他更接近於嚴復（對於嚴復，魯迅一直是尊敬的，直至晚年。這種尊敬讓人覺得他們氣質上的接近）。我以為那就是可以稱為對純真事物的探求之心，它在啓蒙期以一種科學知識的形式表現出來（頁18）。

即使到了晚年，魯迅仍致力於「從卑俗的版畫之中追求一種純真的東

¹ 竹內好說：「如果只把他所選擇的事實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簡單排列的話，將不會成為傳記。……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文學家的傳記，不可能成為他精神歷史以外的東西。他行動著，這個行動作為精神的產物，或者說這個行動產生了精神。」（頁7）

西」，而「對純真事物的探求之心」，即是魯迅的「立場」——魯迅始終探求著某個東西，而它並非屬於（如「政治小說論」所欲發揮之）政治的、啓蒙的事物，魯迅不是梁啟超式的「啓蒙者」。縱或魯迅曾自述，在仙台學醫時，課堂上的幻燈片讓他看到日俄戰爭下中國同胞的可悲，並意識到與其藉醫學來治療國民的肉體，倒不如藉文學來拯救國民的靈魂，於是，他離開仙台並轉向文學。然而，竹內好認為，這不意味著魯迅經歷了「為了搞文學而放棄學醫」的「啟蒙式」轉變：

認為他是為了拯救同胞的精神貧困而立志於文學的想法是無視傳記真實的。他的志向並不在於那種文學——即梁啟超式的文學。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為了逃避它才離開了東京。而且實際上他再次回到東京時也不再追隨梁啟超而是章炳麟，這足以為證。為了拯救同胞的精神貧困而棄醫從文是魯迅自己的解釋，因為他除了這麼解釋之外不能說明自己（頁 19）。

「學醫」與「文學」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毋寧說，「文學」才是最終歸宿：「那是沒有路的路，是永遠值得探索的，像理想一樣繼往開來的，是作為沒有綜合表現而近似於無的東西。」（頁 20）魯迅的自述必須被理解為一種比喻：魯迅本是為了逃離革命和政治社會而到仙台，但仙台事件卻使他在中國同胞身上看到自己，這「正好擊中了他希望從難以逃離的現實中逃離出來的要害，他懊悔

想要逃離的他自己，這是來自現實的復仇。」這樣的逃離也使魯迅意識到，「現實是不可逃避的，弱者不能靠依賴強者而生存。」（頁 21）

作為「行動者」，魯迅一貫的態度總是「逃離」絕望，但正因為無法逃離，從而表現出不斷的掙扎。在魯迅的文學中，「逃離」絕望並不表現為作品世界中的烏托邦建構，魯迅總是「眼睛朝著過去」，而「抓住未來世界這種組織的慾望在他的作品中並沒有顯示出來。」（頁 38）魯迅的「信念」並未被表現為作品中的「未來世界」，而是面向「過去」並試圖擺脫「過去」。魯迅認為，世界上存在兩種人：「奴隸」與「奴隸主」，二者都是人類「自由的敵人」。孫文革命的失敗在於向軍閥官僚妥協，這使他意識到，革命必須改掉國民的劣根性，改革「舊事物」，才是真正地改革，也才能使「奴隸」擺脫「奴隸主」的支配——「作為消滅惡的自己的武器，除了依賴於惡的自己而別無他法。舊的事物得不到許可。可是對抗舊事物的新事物——為一切權威所講的新事物也得不到許可。與舊事物的鬥爭，本身就是與新事物的戰鬥。以自己的陳舊破壞舊事物的同時，也就是以陳舊擦拭新事物的陳舊。」（頁 49）這意味著，「依賴權威」不僅無法脫離支配關係，反而使支配關係更形鞏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換位，僅只是「反復」而已，故魯迅式的革命必須超越「新事物」的引導：「革命，就是超越引導革命的東西。革命是非連續的。它可以瞬間改

變即將行進的秩序的方向，是從無開始的創造。」（頁 78-79）

伊藤虎丸：走向「終末」

伊藤虎丸認為，魯迅關於「奴隸」與「奴隸主」的辯證，意味著以「抵抗」來打破「周而復始」的狀態（頁 43）。這一點構成伊藤虎丸之魯迅詮釋的核心。對伊藤虎丸而言，竹內好對日本近代化的批判與丸山真男對日本思想傳統的反省是相呼應的——丸山真男強調，日本缺乏「歐洲基督教那種意義的傳統」，而「歐洲基督教那種意義的傳統」，指的是日本思想中所缺乏之對「時代觀念」和「思想」賦予「相互關聯性」的主體精神：

不論多麼像樣的眾多的眼睛、耳朵、鼻子拿來擺在一起，也成不了一張臉。賦予思想一種構造，一種整合，這在竹內，就叫做精神，在丸山就叫做「像歐洲基督教那種意義的傳統」（頁 45）。

主體精神是以禁止向作為「既成品」的權威（即「偶像」）屈服（頁 45-46），這同時也要求「人」必須從「作為被直接賦予的現實」中「隔離」出來，並且，其前提是使自身與某個外在超越者相遇，進而以此相遇而展開自我否定、對權威的「既成品」施以變革：

與某個外在超越者相遇，並以此為契機經驗「回心」，通過這一過程把自己從一切中間權威中解放

出來，即把自己從作為身邊社會（例如家族、國家）和自然（例如性）某一部分的狀態中，轉移到「自由精神」（「人格」）的狀態——作為「認識主體」，反過來把「被賦予的現實」作為一個交給自身處理（「合理化」，「對象化」）的「對象」來重新把握，並通過邏輯性重構這一媒介對其實行變革（頁 47）。

「某個外在超越者」對「一切中間權威」而言，是否定，也是解放的契機，其有賴主體精神的運作，因此，「與某個外在超越者相遇」，意味著主體與「某個外在超越者」間有某種「關係」，並否定任何企圖僭越、取代「某個外在超越者」之「偶像」的權威性。藉由否定而來的解放，才使「歷史」（而非「周而復始」）得以可能：「正因為如此，『近代』或竹內所闡述意義上的『歷史』，才只能在歐洲成為可能。」（頁 47）

伊藤虎丸指出，魯迅在留日期間對於自然科學書、進化論、科幻小說、尼采、克爾凱郭爾（或譯「齊克果」）等，使魯迅從中感受到「自由精神」及其能量，「並且以進化論者和尼采式的個人主義者這一形態，把它們化做自己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初期魯迅思想是何種主義並不是重要問題，重要的是他獲得了歐洲的『精神』）。」（頁 48）伊藤虎丸引述丸山升的觀點，強調魯迅所獲得的「自由精神」，表現出早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就已擁有的「革命」意識：「革命」體現在文學內部，而文學作

為「真言」，乃是「自由精神」的自我呈現（頁48-49）。

伊藤虎丸引述丸山升的觀點，說明魯迅文學的核心，在於追求「自由精神」與「真言」，而這指向必須以「語言」（即「文藝」或「人文性」）的整體性作為前提（頁83）。「語言」使民族得以凝具整體性，也是文明的動力所在，一旦失去「語言」，文明將走向「蕭條」、「寂寞」（頁83-84）。伊藤虎丸指出，魯迅和其弟周作人共同編譯的「域外小說集」之所以選擇以不同於當時主流之白話文的古文形式呈現，是為了以古文形式來展示「異質的」西方文明精神（頁85），而「異質的」西方文明精神不同於中國文明之處，在於「語言」表達了個人的「心聲」、「內曜」，並展現擺脫「外力」支配的人格，故「語言」與人的自立有關。此種語言觀源於作為「啟示宗教」的基督教。「啟示宗教」即「語言的宗教」，透過對「語言」的把握而「徹底否定和克服咒術世界」。不同於冥思式的神秘體驗，「語言的宗教」強調「神的聲音」透過講述並干涉和民族命運相關的歷史與社會的現實，迫使人們在當下做出決斷，從而改變歷史（頁88-89）。就此而言，魯迅受尼采的影響，意味著受此「語言的宗教」的影響。

伊藤虎丸認為，尼采雖然具有強烈的反基督教色彩，但這並不意味著尼采是宗教的破壞者，毋寧說更是宗教的探求者，尼采對於事物的「把握方式」是「宗教」的——尼采反對墮落的、僵化的基督教，而探求真正的

基督教。²當論及阮籍與魏晉時代的風氣時，魯迅強調，「背德者」其實才是「道德者」，正如「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是不同的。這種超越「名目上」的異同而聚焦於對問題之「把握方式」的立場，強化了主體與「某個外在超越者」相遇的「關係」，進而展開對現狀或既有權威的批判，這表明了革命的意義：「永遠革命者」不會將革命的普及視為革命的成功，而是將之視為革命的墮落並加以破卻（頁113）。主體與「某個外在超越者」的相遇，使「持續的鬥爭」自我呈現為「永遠革命」：

這種精神方式就意味著與「什麼人」（外在的他者）構成關係，並且通過這種相遇不斷否定現世（包括既成宗教），把現世相對化，從而與被現世的埋沒作持續的鬥爭。而在這個意義上的宗教性，即使在可以在宗教學上被分為幾類的世界宗教當中，在超神教（「人格」宗教）當中，也會被認為是最富有特徵性的那種（頁114）。

伊藤虎丸認為，從此視角來觀看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會發現，如康有為或章炳麟，並沒有意識到「啟示宗教」或「語言的宗教」所形構的西方近代精神，而是尋找「在以基督教為對象的意識前提下所要尋求的欲使之取代業已喪失作為最高價值之力的儒教的宗教」（以「民族整合原理」來

² 伊藤虎丸明言，這樣的理解與竹內好認為魯迅的文學中有某種近似於宗教性之「原罪意識」的東西的觀點有關（伊藤虎丸，2008：108-111）。

取代「某個外在超越者」）。相較之下，魯迅受到尼采影響，意味著對康有為或章炳麟而言，此乃「異質的」精神，也如尼采那般地揭示出「民族整合原理的有效性正在喪失」（上帝已死），從而使「個人」得以從民族整體中解放出來（頁118）。因此，這樣的思考「迫使每個人都做出主體性的決斷」（頁136）。伊藤虎丸認為，這樣的思考體現出「終末論」的意義：「時間滿了，上帝之國臨近了」，主體必須決斷，惟有如此，才能夠對抗作為「整體」之「自然時間」的「反復」（頁136）。³

汪暉：啟蒙、夢與忠誠

對魯迅而言，「寂漠」是中國文明的狀態，而這種狀態來自於人們之「心聲」、「內曜」的喪失，「寂漠為政，天地閉也」！魯迅將「寂漠」

表述為「人界的荒涼」，指的是人們在嘈雜擾攘的世界中聽不到內心的聲音（頁31）假若能夠激發人們內在的「心聲」、「內曜」，則「群」的覺醒就有可能。汪暉指出，面對著中國必須改革的聲浪，魯迅的思考意味著「中國和世界的改造並不取決於各種各樣的外在的革命和變革，而取決於一種內在的革命。」（頁34）

在魯迅的思想中，天才人物、超人的存在，能使「群」的覺醒實現，但卻不是透過「喚醒」，而是「激發」。汪暉在此指出「激發」的深刻意義：

魯迅強調要靠這樣的人來激發大眾——不是喚醒，是通過自我表達而激發。但是，這個「激發」不是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去「喚醒」大家，變成「國民」，也不是像吳稚暉等人那樣「喚醒」大家，趕快變成「世界人」，而是大家各自成為自己，即表達自己心聲的人（頁36）。

從「個」與「群」的關係來看，魯迅強調「人各有己」（即人的「自主性」）而使「群之大覺」實現，意味著「群之大覺」是「人各有己」的結果：「『群』是一個有內在性的存在狀態，這種內在性存在於每一個人能夠傾聽自己的心聲、展現自己的內曜的時刻，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通過心聲和內曜的相互激盪產生的。」將這點延伸到魯迅的對於社會、政治改造等問題的理解，改造必須「通過一個所謂的內在性的問題、精神的問題」來解決（頁41）。

³ 伊藤虎丸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關於「進化論」的論述做了分析，指出嚴復和魯迅所接受的「進化論」不同。對嚴復而言，他接受以「最適者」為核心的斯賓塞式的「進化論」，從而強化了具有宿命論之宋代理學的「一元性宇宙論」；相反地，魯迅所接受的「進化論」則是赫胥黎式的，強調「倫理的進化」，因而具有基督教終末論的色彩。伊藤虎丸指出，對比兩種「進化論」，前者僅將「個」視為是「全體」的一部分，而後者則是將「個」不僅視為「全體」的一部分，更視其為不可被「全體」所否定的「個」。簡單地說，魯迅所接受的以「倫理的進化」為核心的「進化論」，強調某種超越「全體」、使「個」能夠直接和能夠否定「全體」之超越者直接關聯的倫理觀。伊藤虎丸指出，正是這點，人的「主體性」才能夠從「自然有機體秩序」中被解放出來，並由此朝向「具有主體性和互相倫理契約關係的共同體的形成」。是故，「倫理的進化」就具有與作為「宇宙過程」加以對抗的意味，「其本身也正是深深根植於基督教的這種人之觀念的傳統」（伊藤虎丸，2008：151-152）。

對於「個」與「群」之關係的思考，也引伸出魯迅思想中「平等」的意涵。吳稚暉和章太炎曾針對是否應以「世界語」來追求世界大同。對吳稚暉而言，語言僅是交流的工具，語言統一即可消除彼此間的利益衝突；相反地，章太炎認為，語言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人的創造與內心的表達，人的差異也透過語言來表現的。這樣的爭論其實蘊含著對於「平等」、「差異」的政治思考。吳稚暉的觀點意味著藉由否定「差異」來追求「平等」，章太炎則強調「以不齊為齊」、以事物的「獨特性」為前提的「平等」。汪暉認為，魯迅的立場無疑地與章太炎較為接近：「章太炎、魯迅從一種與形式平等截然不同的『差異平等』觀出發，把整個世界的差異性作為其語言論的前提。」（頁49）藉由「心聲」、「內曜」來思考「個」與「群」的關係，表達了對於「普遍性」的思考。

汪暉指出，章太炎或魯迅的語言論雖與民族主義有密切關聯，「但內涵更複雜」，雖然「民族主義語言觀包含著拒絕帝國語言的內涵」，但民族主義語言觀無法說明截然不同、毫無共通性的語言如何能夠在主體間相互「激發」。因此，章太炎、魯迅以「差異」為前提的思考，具有反「普遍性」與「統一性」的意涵，而「相互激發的、主體性的語言觀預設了主體間相互激發的條件，即一種差異性平等的狀態」，是一種「含藏萬有和吹萬不同的反公理主義的普遍主義宇宙論」（頁49-52）。對汪暉而言，章太炎與魯迅所提出的是「含藏萬有」、

「吹萬不同」的平等觀，比「拒絕帝國語言」之民族主義語言觀更為複雜。⁴

除了「個」與「群」的思考，汪暉也探討魯迅文學本質的問題。汪暉藉由「夢」和「忠誠」來說明魯迅文學的本質。⁵魯迅曾自言，年輕時有過許多夢，但後來大半都忘卻了，但有些夢卻是無法忘卻，從而成為文學作品《吶喊》的由來。汪暉認為，魯迅的人生中至少存在著三個夢：「離家後的逃往異地以尋求別樣的人們」、

⁴ 為了解釋「相互激發」的可能性，汪暉藉由魯迅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之語言論爭的問題來間接地說明之。從汪暉的行文脈絡來看，在討論民族主義語言觀和章太炎、魯迅之立場的差異後，汪暉隨即討論魯迅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之語言論爭的問題。簡單地說，問題的關鍵在於：魯迅為什麼從使用古文寫作而轉向文學革命？亦即，這兩個看似不同立場間的轉化如何可能？汪暉說：「第一，古文與白話都將文言及其體制視為自己的對立面；第二，古文論者與白話論者都將語言與內心關係視為語言變革的關鍵環節；第三，古文論者將古文視為古代的口語，而白話論者將白話視為今人的口語，兩者均以『發聲自心』這一聲音論為出發點；第四，古文運動致力於創造『民族語』，而白話運動致力於建立『國語』，兩者均與民族主義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汪暉，2013：52）汪暉的意思是，藉由一種對於現有體制的抵抗，這種抵抗來自於「內心」聲音的發出，在古文和白話文二者之形式差異的背後，隱含著更為真實的核心，其核心即是「心聲」。藉由「心聲」，形式的差異被超越，不同形式間的「相互激發」成為可能。不過，汪暉也提醒我們，古文與白話的差異也不能忽視，「因為古文與追根尋源的國粹觀有著密切的關係」（汪暉，2013：24），也是對於宋代以降士大夫階層及其政治文化的批判與否定（汪暉，2013：21）。這樣看來，魯迅運用古文來探尋中國的「心聲」，應該與他著意於從歷史中摸索中國自身的「路」——「沒有路的路」——有關，也體現出某種以反傳統的方式繼承傳統的精神。

⁵ 汪暉之所以藉由「忠誠」來說明魯迅的文學特質，是為了解決竹內好之魯迅詮釋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關於這點，可參見本文註9。

「東渡日本學醫以救治國人的身體」，以及「棄醫從文以拯救國人的靈魂」（頁115）。這些事情都曾使魯迅感到挫折，故魯迅選擇主動地遺忘。⁶然而，魯迅不能忘卻這些夢，呈顯出某種深刻的意義：「遺忘是為了避免被夢所欺騙，或者說基於破滅的痛苦，但這一主動行動的失敗也意味著以夢為形式的記憶獲得了自我展開的能量，它的表現形式便是對夢的不由自主的、堅固的忠誠，以及違背自己的願望而投入戰鬥（吶喊）的行動。」

（頁120）汪暉提醒我們，「與其將夢的展開解釋為主動性的失敗，不如解釋為主動性的位移，即從作者向夢自身的位移」（頁120）——夢以企圖擊敗作者之主動遺忘的舉動，獲得自身展開的能量，並圍繞魯迅一生，使魯迅在「違背自己的願望而投入戰鬥（吶喊）的行動」中展現出「忠誠」。

汪暉認為，惟有藉由「夢」、「寂寞」與「忠誠」才能解釋何以魯迅總是能夠在失敗的境地中堅韌地前行。「忠誠」，「初看上去是對連續性的執著，其實未必，毋寧是在變化的情境中、在失敗的境地裡對於基本理念的堅持。」（頁146）無論是批判辛亥革命，或對民初、民元的懷念、惆悵，抑或對新文化運動的不滿，魯迅都「忠誠地」堅持基本的理念，他的「忠誠」正如阮籍、嵇康在「普遍背叛的語境中」藉由「反禮教」的姿態來表達「對禮教的忠誠」一般，使其自始至終具有政治性（頁146-147）。

事實上，魯迅的「寂寞」，以及對於「夢」的「忠誠」，不僅意味著他獨自的戰鬥姿態，同時也從中可以發現到他意識到集體戰鬥、打破「寂寞」的可能。魯迅在創造《狂人日記》之前，老友「金心異」（即錢玄同）質問他獨自沉浸於鈔古碑究竟有何意義時，魯迅感受到老友身上的寂寞，而這樣的感覺是《狂人日記》的契機。對此，汪暉說：「這種對於『寂寞的關聯性』的發現不但將寂寞社會化了，而且也提供了與這種社會狀態進行鬥爭的集體條件。」（頁164）魯迅與老友的「寂寞」「相互激發」，使「寂寞成為戰鬥者之間產生同志感的基礎」，從而為「打破寂寞」塑造了條件（頁164-165）。再者，「相互激發」的「寂寞」，使魯迅意識到，即使自己對「希望」有所絕望，「希望」卻已不再是主觀的東西：「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頁166）對此，汪暉如此說：

希望是客觀的可能性，是比「我」的經驗廣闊得多的未來之夢，它存在於錢玄同所謂「幾個人既然起來」這一行動之中。幾個人的起來是一種癥候，一種存在於許多人身上或生命中的、尚未展現出來的潛在的可能性。因此，身內的寂寞並不能構成對於希望的否定（頁167）。

魯迅因對「夢」絕望，故主動地選擇遺忘，但卻始終無法忘卻，而「相

⁶ 關於魯迅一生中的三個夢的描繪，參見汪暉（2013：135-139）。

互激發」的「寂寞」，則使魯迅在絕望中「反抗絕望」，並且，「在困頓的處境中保存希望」，正是魯迅之「忠誠」的體現，才能表現為他對「廣闊的世界」和「無限的未來」的探尋（頁172）。

從否定到革命

筆者認為，上文所引述之三人的魯迅詮釋，其共同點在於顯示出一條「從否定到革命」的思考方式。「否定」之所以構成上述三人之魯迅詮釋的重點之一，乃因魯迅自身顯示了在面對西方文明時的「立場」。當然，說魯迅顯示出「立場」，並不意味著對此「立場」只有一種詮釋的可能。

對竹內好而言，「否定」表現為魯迅總將「眼睛朝著過去」，在面向「過去」的同時企圖擺脫「過去」。建構一個屬於未來的烏托邦，從來不是魯迅面對自身、面對歷史的態度，「新事物」無法成為取代、超越「舊事物」之「新」，是因為魯迅相信「革命」的意義就在於堅信「永遠革命」的態度。從竹內好自身的論述脈絡來看，他的魯迅詮釋乃是為了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竹內好認為，「革命」對日本人而言「諱莫如深」，但惟有導入「革命」的概念，才能夠把握魯迅的精神（竹內好，2007：114，註1）。在革命的失敗者孫文身上，魯迅看到了孫文「甚至破卻了親手締造的中華民國」——即以「革命尚未成功」來「破卻現在」，並且，「對於永遠的革命者來說，所有的革命都是

失敗的。不是失敗的革命不是真革命。」（竹內好，2007：114）對竹內好而言，魯迅之所以成為「新中國的精神支柱」，是因為他「一直不斷的思索著一條使中國民眾正視自己的不幸、與周圍的人一起走向幸福的道路」，魯迅之於日本人的意義即在於「研讀魯迅，是為了拂去那些幸福的幻想，思考我們自身的不幸，從而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竹內好，2013：4）「幸福的幻想」，反映出日本的近代化乃是建立在接受歐洲所設定之文明進程的基礎上，這意味著「主體性的缺失」——「主體不具備自我，是因為主體放棄了自我成為自我的可能，即放棄了抵抗。」（竹內好，2013：208）因此，對竹內好而言，「革命」是對於「現在」的「破卻」，也是「超越引導革命的東西」。

以 1960 年代末的學生運動為契機，伊藤虎丸注意到，大學改革與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的實踐有著密切的關聯。「學問整體性的喪失」（科學與思想和人相分離），反映出「學問細分化和專業化」的傾向，但這並非是戰後日本才面臨的問題，在伊藤虎丸看來，戰前日本所認知的「近代科學」，乃是以製造零式戰鬥機與大和艦為目的的工具，故「近代科學」並未改變日本的舊秩序。這清楚地反映出他對於日本近代化的批判。對伊藤虎丸而言，「文化整體性恢復」才是大學改革與戰後民主主義實踐的核心（伊藤虎丸，2008：21-22），因此，他的魯迅詮釋展現出尼采式之「終末論」的色彩。對他而言，惟有「終末論」才能使民主主義所強調之「個」

的概念得以確立，並繼承「近代科學」之主體精神，使日本實現近代化。⁷

在汪暉的魯迅詮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以魯迅為媒介，提出了以「差異平等」來理解「普遍性」的思考，以及強調魯迅一生對於「夢」的「忠誠」。這兩個面向的論述，都涉及了當代中國思想的若干辯論。就前者而言，汪暉認為，魯迅的「差異平等」觀體現出打破「民族主義與全球化的二元論」的探索，因而是「一個中國心靈對於『什麼是啟蒙』這一問題的獨特追問」（汪暉，2013：89）；就後者而言，「夢」與「忠誠」著重於對「廣闊的世界」和「無限的未來」的探尋，故不同於寄希望於「勝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來」，當「今天的中國」有許多人「以咒罵革命黨為亂黨為榮」，這顯示出這些人才是真正的「轉向」者（汪暉，2013：183）。

⁸面對魯迅，汪暉的基本關懷是：對於

⁷ 事實上，伊藤虎丸對於竹內好所提出之中國近代的「雙重抵抗」（反帝、反封建）過程，進行了「改讀」。他不將「反帝」、「反封建」侷限於政治、經濟的面向，反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竹內好式的「雙重抵抗」：「這是以對西歐近待所產生的制度和人類意識之入侵的抵抗（反帝）為媒介的、對制度和意識的接受（反封建）的過程。」（伊藤虎丸，2005：10-11）對他而言，從「文化」的角度來思考「雙重抵抗」，乃是為了重新梳理文學、科學與道德三者——文化的全體性——的關係（伊藤虎丸，2005：13）。因此，在伊藤虎丸的魯迅詮釋中，他著重在對於西方近代精神與「終末論」的關聯性，從而使魯迅思想擁有了超越性的特質。也可以說，對伊藤虎丸而言，竹內好所要求之「破卻」並「超越引導革命的東西」，必須以「終末論」為前提才有可能。

⁸ 汪暉的這個批判，清楚地意指了當代中國知識界對於五四精神、啟蒙、乃至於中國革命的評價問題，而這也與當代中國知識界思考中國改革問題的關懷有密切的關聯。

當代中國的理解，必須以把握中國革命的內在精神——對於「沒有路的路」的探尋——為前提。⁹

從三人對於魯迅的詮釋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三人都試圖在魯迅身上探尋面對時代課題的思想資源，透過「回向魯迅」，批判性地「介入」（intervention）其各自所身處的當下，由此而彰顯出魯迅思想遺產的珍貴，而魯迅也迫使我們不斷地追問：究竟何謂啟蒙？

⁹ 因受限於篇幅所致，筆者無法在正文中說明汪暉對竹內好與伊藤虎丸之魯迅詮釋的意見，僅能以此註解說明之。汪暉認為，竹內好雖然強調了魯迅思想中的「無」的意義，著意於探討「基於斷裂而產生心的主體性問題」，但卻「沒有具體討論如何改變現實」，也「不提供政治的意義」。相反地，汪暉則藉由「夢」與「忠誠」來說明魯迅一生精神運動的一貫方向，並認為惟有如此才能夠清楚地說明「無」的「斷裂」如何與魯迅「忠誠」於「永遠革命」之理念的態度連繫起來（汪暉，2013：144-146）。另外，對於伊藤虎丸談論之魯迅思想中的「超越性」，汪暉認為，魯迅的「超越性」並不表現為基督教式的「向上超越」，而是向「鬼」——「向下」——的方向「超越」。

「向下超越」，指的是在魯迅的思想中，「鬼」體現著「現在與過去在我們的行為和思想中匯聚」，是「已死的歷史的在場，即我們自身」，也是在「過去」與「現在」間的徘徊反抗，而革命者也就是「鬼」。作為革命者的「鬼」，從自身中摸索未知的道路，是「一種能動的力量」，「一種在黑暗中照見黑暗的黑暗的光芒」。對當代的我們而言，「向下超越」提供了一個從「鬼」的眼光來看待「現代」、「啟蒙」、「進步」、「左翼」與「革命」的視野，從而體現出中國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汪暉，2008：456-459）。

參考書目

- 竹內好著，孫歌編，李冬木、趙京華、
孫歌譯，2005，《近代的超克》，
北京：三聯書店。
- 汪暉，2008，《反抗絕望：魯迅及
其文學世界》，北京：三聯書店。
- 伊藤虎丸著，孫猛、徐江、李冬木譯，
2005，《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
——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2 版。

Losers' Consent: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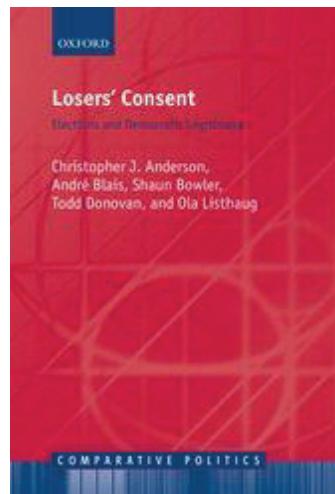
Christopher J. Anderson ... [et al.]

巫俊穎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一、本書寫作緣起

政治秩序的不穩定向來是國家領導者極力防止的，歷史上許多暴亂、起義甚至流血革命都指向一個事實：人民對政治現況感到不滿。學術界對於「人民為何不滿甚至憤怒」的討論和研究相當豐富，而本書告訴讀者其中一項可能因素：人民支持的候選人（政黨）落選了。

選舉是民主政治運作的核心機制，因為選舉決定了誰取得能進行資源分配以及主導政策走向的權力，選舉不但是政府組成的基礎，也是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因此，政治學界對於選舉制度特質的比較、各政黨的選舉策略、選民的投票行為等領域著墨甚深。選舉既然是一个競爭的過程，就不可能產生滿足所有需求的結果，投票對象是個人決定的而選舉結果是集體決定的，沒有選民希望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落敗，但是選舉不可避免的會產生贏家（winner）和輸家（loser），在本書中，兩者判別標準在於投票對象是否贏得行政權。¹本書作者點出這兩類公民在心態上的差異：贏家基於其支持的選舉政見能成為往後的政府施政方針，自然對現有制度的運作較無怨言，而我們也能合理地預期輸家對於選舉結果甚至現行體制的運作會感到不滿或忿恨。



書名：Losers' Consent: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作者：Christopher J.
Anderson ... [et al.]

出版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Oxford；New
York

日期：2005

頁數：240 pages

ISBN：9780199232000

¹ 換言之，假設在一個內閣制國家，某選民投票支持的候選人贏得該選區的國會議員選舉，如果該當選人所屬政黨無法取得組閣權，屬於國會之中的反對黨，則該選民在本書分析之中，仍被視為輸家。而總統制國家的贏家和輸家則以總統大選結果作為判別標準。

作者指出，民主制度必須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持才比較能夠穩定維持，事實上，在當代的民主國家之中，真正基於多數（majority）選票支持而組建的政府比例反而低於由少數（minority）選票支持所組成的政府，這現象在採用相對多數決選制（即所謂的 First-past-the-post）的國家之中更為明顯。²在選舉贏家往往是少數派的情形下，選舉輸家能否克服不愉快的心理、接受選舉結果並願意投入下次選舉，是民主政治能否長久維繫一項重要關鍵因素，因此作者認為針對選舉輸家的態度研究能幫助我們洞悉民主體制的韌性及脆弱。

本書的五位作者之中，有三位來自美國，一位來自加拿大，一位來自挪威，擅長領域皆是比較選舉、公民政治參與、公民政治行為研究。

二、主要分析

書中最主要使用的依變項為民主體制運作滿意度以及民主政體支持度，前者衡量公民對該國民主政治的運作是否感到滿意；後者詢問公民是否願意在任何情形下都支持民主為該國政體，它們皆是民主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構成。³在研究設計上，作者沿著

兩條主軸進行分析，第一是公民個體態度（微觀角度），第二是政治制度（宏觀角度），前者探討選舉贏家和輸家對民主政治的態度差異，後者則研究不同規則、形式、結構的制度對於選舉輸家的心理起了什麼樣的中介作用，兩者共同影響了人民心中的民主統治正當性。本書使用了跨國（cross-national）資料比較數個民主國家之中，⁴選舉贏家和輸家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之差異。作者發現在大部分國家之中，選舉輸家比起贏家確實對於己國的民主運作較為不滿、政治效能感較低而且政治價值觀較為背離民主原則，採取抗議手段的頻率也較高；跨時間（cross-temporal）資料顯示即使政黨輪替使原本的贏家和輸家立場互換，上述情況依然會發生。然而數據亦顯示上述情況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⁵因而引起作者做進一步的探討：什麼因素造就了選舉輸家的不滿並導致贏家和輸家顯著的政治態度落差？

作者認為選民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個人政治立場都是影響輸家政治態度的主因，例如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輸家因為較少經歷落敗的洗禮，容易

第36至37頁。

⁴ 本書使用的資料來源包括 Eurobarometer (EB) surveys, the 1996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 survey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 (CSES), the 1999 European Values Surveys (EVS) and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surveys. 本書研究對象則以美國、加拿大、歐洲國家為主。

⁵ 上述四個政治態度及行為指標之中，均有少部分國家不存在輸家和贏家的差異，甚至有贏家反而比輸家對現有民主體制更不滿、政治效能感較低、較為背離民主價值以及採取更多抗議手段的情況。

² 相對多數決選制下，候選人只要贏得最多票即當選，在候選人超過兩位的情況下，容易發生某候選人得票率不到 50%，卻因為其他候選人得票數較低而當選的情形，等於是該當選者組建的政府僅獲得不到過半數的選票支持，本書作者將此情況稱為由少數選票支持所組成的政府。例如菲律賓 1992 年、1998 年、2004 年、2010 年總統大選，都是當選者未獲得過半數選票的情況。

³ 關於這部份的細部描述，請參閱本書第三章

對民主原則失去信心，研究資料證實了這點（雖然仍有少數例外），特別是中東歐國家之中支持前共產黨的選民，民主讓他們的支持對象從過去長期獨霸政壇的地位變成反對黨。在個人政治立場方面，本書研究顯示擁有極端意識型態或強烈政黨認同的選民一旦成為選舉贏家，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會猛然上升；但是當他們成為選舉輸家時，對民主政治的批判並無顯著高於中間選民。

在選舉輸家和贏家確實存在政治態度落差的國家之中，不同的制度規範是否造成落差擴大或縮小？作者發現在選舉制度採取封閉名單式的比例代表制，或是多個政黨組聯合政府的包容性（inclusive）體制下，⁶贏家與輸家的態度落差就會比採取單一選區選制與單一政黨執政的排他性（exclusive）體制明顯較小；聯邦制國家比起單一制國家，前述落差亦較小，因為輸家在聯邦層級選舉失利的失落感能從州（省、邦）層級的勝利得到彌補。作者同時也發現選舉輸家會比較傾向贊成更動不利於其支持對象的選舉規則，成為敦促制度改革的潛在力量。比較個別選舉輸家之間的態度差異，作者發現所處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個人教育程度，或支持的落敗政黨過去有無執政經驗，都會影響個別選舉輸家對民主政治的支持度、對選舉公平性的看法和政治效能感高低。

⁶ 但是作者也指出，當組成聯合政府的政黨數量超過某個門檻時，輸家對民主運作的不滿程度反而會上升。

三、評論

本書是典型的比較政治領域的學術著作，雖然它不是開創新研究途徑的經典大作，在本書出版之前亦有不少關注選舉贏家和輸家政治態度差異的研究論文，但是本書的分析層次涵蓋了個體和總體層次，並使用較新的調查資料，針對先前相關文獻所提出的政治態度（依變項）和影響因素（自變項）做一系列的重新檢證。在研究對象範圍方面，作者除了採用多國比較的模型之外，也有針對單一國家的研究。⁷

本書的研究主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輸家對政府施政不滿是正常的，然而如果輸家的不滿是針對整套民主體制，甚至對民主體制失去信心，就容易產生政治動盪，蒙古和泰國都發生過由於在野陣營已不相信現有體制處理政治僵局的能力及公正性，因而採用暴力抗爭的手段迫使執政者讓步的事件（張傳賢，2009）。在藍綠兩大陣營已然成形的我國，也有不少學者關注選民的支持政黨是執政或在野對其政治態度有何影響（盛治仁，2003；張佑宗，2009；黃信豪，2011；張佑宗，2011；林聰吉，2013）。

當然，本書並非完美之作，而有些不足之處並非源自作者的研究設計疏漏，例如在總統制國家之中，假設

⁷ 例如在本書第七章針對加拿大的研究之中，作者區分加拿大全國受訪者、魁北克省受訪者和其他省分受訪者並建立三個迴歸模型，比較自變項對於依變項（民主運作滿意度）的影響效果在三個模型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從而檢視聯邦制能否調節贏家和輸家之間的政治態度差異。

有一位選民在總統大選投給敗選者而在國會大選投給了贏得過半數席次的政黨，其失落感可能因為國會選舉的勝利而得到補償，對體制的不滿可能低於在總統和國會選舉都投給敗選陣營的選民，然而在許多國家，調查問卷僅詢問受訪者總統選舉投票對象，⁸從而無法分辨出前述兩類受訪者。有些本書不足之處則是筆者認為可以再討論的，首先，作者點出「制度」對贏家和輸家的政治態度差異具有中介調節作用，其實除了制度之外，社會分歧也是可能的影響因素，例如一個投票給反對陣營的少數族群選民，和一個投票給反對陣營的優勢族群選民，雖然皆屬於輸家，但是政治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因為前者會預期自己的利益將徹底被排除於政策制訂過程之外。第二，雖然本書研究對象（國家）眾多，卻多侷限於歐洲和北美，⁹這使本書所探討的新興民主國家幾乎都是中東歐前共產國家，大多是在民主化過程之中，前共產黨解散或重組且政治實力大不如前的類型，而缺乏像臺灣、南韓這類威權時期非由共產黨執政，且民主化之後從前的執政黨仍具備問鼎執政能力、政治影響力龐大的新興民主國家。

隨著世界上有越來越多國家具備選舉機制，關於贏家和輸家的政治態度差異之研究也必然持續下去，且隨

⁸ 例如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詢問蒙古、南韓、臺灣、菲律賓和印尼受訪者的投票對象，都是總統或國會選舉二擇一為題目。

⁹ Moehler (2009) 和 Moehler and Lindberg (2009) 對非洲國家的贏家與輸家政治態度做出深入的分析。亞洲國家在這主題的比較研究包括張傳賢(2009)和 Jou(2009)。

著調查資料的逐步完備，未來將有越來越多地區能進行縱橫資料（panel data）分析。整體而言，本書提供完整且系統性的比較分析，並匯集五位作者各自擅長的研究對象及方法，加上書本著作不受篇幅限制，能將假設和實證背後的思維脈絡、邏輯推演做深入淺出的詳細描述，讓本書相當適合甫接觸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的初學者閱讀。

參考書目

- 張傳賢，2009，〈民主的脆弱性與鞏固：一個敗者同意的視角〉，《政治科學論叢》，42: 43-84。
- 張佑宗，2009，〈選舉輸家與民主鞏固—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落選陣營對民主的態度〉，《台灣民主季刊》，6(1): 41-72。
- 張佑宗，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台灣民主季刊》，8(2): 99-137。
- 黃信豪，2011，〈民主態度的類型—台灣民眾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選舉研究》，18(1): 1-34。
- 林聰吉，2013，〈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嗎？—探索台灣總統大選的選舉輸家〉，《台灣民主季刊》，10(1): 1-34。
- 盛治仁，2003，〈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選舉研究》，10(1): 150-70。
- Jou, Willy. 2009. "Political Support

- from Election Losers in Asian Democracie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5(2): 145-175.
- Moehler, Devra C. 2009. “Critical Citizens and Submissive Subjects: Election Losers and Winners in Af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2): 345-366.
- Moehler Devra C. and Staffan I. Lindberg. 2009. “Narrowing the Legitimacy Gap: Turnovers as a Caus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71(4): 1448-66.

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

劉高登(Gordon Laird)

周雅薇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去好市多或家樂福是何時？再回想一下當時你享受折扣的喜悅，翻開這本書，作者 Gordon Laird 會帶你以新的方式衡量你在這個時刻省下的幾十塊錢，背後所隱藏的政治經濟學內幕。作者劉高登 (Gordon Laird) 並非科班出身的政治學或經濟學者，但他對廉價商品的深刻觀察，卻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視與審思在學院中被奉為聖經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特別是這兩個：(1) 商品的廉價化代表市場經濟競爭的全面化，也就意味著消費者能通過更多的選擇與更少的成本換取更大的利益；(2) 依據比較利益所形成的國際分工，有助於開發中國家擺脫貧窮。劉高登的立場簡單且犀利：廉價商品建立在垂直壟斷的跨國新形態企業，而其基礎是終將（也即將）耗盡，開發中國家廉價的生產因素。



書名：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

作者：劉高登(Gordon Laird)

出版者：博雅書屋

出版地：臺北市

日期：2012

頁數：407 頁

ISBN：9789866098475

廉價商品：海灘上的沙堡

劉高登認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高科技產業或管理，種種運用新科技與新生產的產業，而是廉價商品業者，它是一個科技、運輸、管理與能源環環相扣的複合體（頁85），這包含了零售業與任何聲稱可以讓消費者用廉價買到商品的企業。廉價商品業者並不只是賣大量便宜貨物給消費者的公司，它是一種能夠整合與管理世界上所有資源供應、運輸系統，並以龐大的收益與需求迫使供應商壓低價格來維持低成本的服務業者（頁116）。也因此廉價商品業者不只是一種能獲利極大化的公司，它還是一種能掌控全球資源，尤其是能源的龐大機器。廉價商品可以快速發展的誘因，來自於無論經濟好壞，我們都渴望折扣的誘惑，特別是在經濟衰退時，所得下降，失業問題惡化時，消費者對廉價商品的依賴更深（頁87-88，頁133）。

與學院經濟學對於自由市場的想像不同，廉價商品的出現，遠遠不是代表市場的完全競爭，據劉高登所觀察，恰恰相反，廉價商品的出現製造了市場完全競爭的假象，但它事實上建立在破壞一般市場上的價格與物品價值的關係，物品的價格並不是反映了在製造過程中所投入的生產要素總和，或者是商品更有價值的新技術（頁113-18，頁126）。廉價商品的成功建立在破壞價格，將物品的價格壓低到其他業者都無法承受的程度（頁118）。而廉價商品業者能夠藉超低價獲取利益的基礎建構在壓低成本的能力，廉家商業者靠著中央集權的緊密

控制系統，掌握與監視每一種生產要素能以最低成本下投入生產（頁116-19），業者並自己不用生產任何物品，而是透過掌握與控制世界上大部分的資源，壟斷商品的價格。諷刺的是，廉價商品的出現，所意味的遠遠不是市場的完全競爭，而是一種垂直壟斷上下游的廠商。

因此，廉價商品的運作基礎，並不是人類經濟市場高度發達後，能讓消費者享受低價商品的完美銷售模式。事實上，廉價商品業者壓低成本的方式非常脆弱，並且可能快走到了盡頭。作者在書中指出，廉價商品能夠壓低成本的基礎，其實是乃基於在幾個讓人類悄悄負債的方式上，主要集中在開發中國家的生產要素，諸如糧食與能源，因為廉價商品業者快速與大量生產的流程與成本壓力，以超過上個世紀的更快速度消耗，資源有限，但消耗的速度卻是越來越快（頁124）。各國無不競逐搶奪尚未完全開發的生產要素，例如中國為防止歐美業者壟斷能源版圖，著力在非洲與中亞建立能源版圖，表面上看起來，已開發國家的工廠似乎被一輛輛的運輸車取代，但事實上這不過是將汙染與環境成本轉嫁到其他弱勢過家（頁224）。但高度仰賴塑膠、貨櫃運輸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空汙，嚴重程度迫使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採取更嚴格的環境規範（頁216）。便宜的勞動力，則隨著中國的勞動規範的綿密化，可能逐漸無法維繫過去的低水平（頁143），金融海嘯後，建立在虛幻而脆弱的信用或債務而非實物價值的財務系統更增加資金運作的風險（頁286，

頁 289-96)。這些理由加總起來，都顯示維持廉價商品低成本的基礎事實上搖搖欲墜。

窮途末路？只好飲鴆止渴？

當世界上的糧食、能源都被廉價商品供應鏈較以往人類經濟歷史更快速消耗時，留給我們的是一個詭異的生存環境：你可以買到越來越便宜的衣服或面膜，但你賴以維生的食物、燃料卻可能越來越貴（頁 289），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當下享受的折扣，其實建立在未來得花更多錢獲取必需品的代價上；廉價商品業者對廉價人力需求，刻意阻礙員工組成工會的例子層出不窮（頁 76-77），也造成其國內產業外移與失業，而當薪資與就業率下降時，我們就又陷入因為所得減少加深對廉價商品依賴的惡性循環（頁 87-88）；廉價商品也妨礙外移地的民主化與政治體制的改革，以中國的個案來說，廉價商品業者能靠產業外移至中國壓低成本，其實是建築在中國能壓制任何勞工與環境的抗爭，換取外國資本在中國繼續投資，以及能靠賄絡掩蓋一切問題，中國才能繼續維持經濟成長（頁 155-45）。

中國的勞工自殺或安全問題也發生在臺灣的鴻海與其他為了追求便宜人力的臺灣公司（頁 153-54），這提醒我們在評價兩岸經貿協議時，過度侷限於經濟利益的盲點，更開放、更廉價、更便宜並不就代表一個讓消費者更有利的立場，關鍵是兩岸勞工在貿易中的位置，更開放的貿易關係如果是以阻礙中國民主化，犧牲中國勞工的代價換來，那無疑飲鴆止渴，台灣

的民主也就岌岌可危。劉高登長期關注美中台問題，對於美國的對中政策頗有批判，以柯林頓為首的政治策士認定（也包括台灣好一些政學高層），如果能讓中美的經濟往來更為頻繁，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將有利於其民主化的推動。

但對劉高登來說，阻礙中國民主化的，正是美國的廉價商品業者！表面上美國的廉價商品業者帶給了中國勞工更多的工作，但同時，廉價商品業者也必須依靠中國威權體系維持其低成本，劉高登甚至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中國一樣，用威權的維穩體制，一次到位地控制所有廉價商品所需的生產要素（頁 316），廉價商品業者與威權政府的利益複合體，又反過來運用資源在國會進行政治遊說以維護其利益，聲稱以中國民主化為目標的美國，能夠打破這個利益共生體嗎？

對爭奪能源的迫切，更加速中國對東土耳其斯坦的血腥戒嚴（頁 253）。尤有甚者，廉價商品的運輸通路，使得種種恐怖攻擊的武器，諸如放射線或生化物質，能以廉價的通路運輸，不用靠自殺式飛機攻擊，廉價商品的通路已經讓所有人暴露在恐怖攻擊的危險中，但卻無從追究（頁 305）！

怎麼辦？

那麼，高價就能拯救我們嗎？劉高登認為，雖然廉價商品業者替全人類節省開銷功不可沒，但是當這一切都是建築在龐大的資源耗損，環境汙

染，甚至影響到教育或醫療等福利系統的供給時，我們要如何做出抉擇？我們怎麼辦？劉高登舉出加拿大能源研究院在2009年所做的研究的例子，確定當石油價格太便宜時，生產者就不會投資在改善能源效率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上（頁354）。跳脫出二選一的邏輯，作者提出幾項解方：以單一稅率配合排放總量與交易機制雙管齊下減少碳排放；不能將貿易政策與人權、環境、公共安全分離討論；確保收入不均的狀況減緩，打破商品越來越便宜，醫療、教育等公共福利卻只能越來越貴的惡性循環，這方面已經有許多社區以在地化的小額貸款，成功跳脫大賣場掌控，重建公平的地方經濟；最後，作者認為應該在促進國際對解決環境、勞工等議題的合作上保留全球化（頁356）。

此外，劉高登的著作或許也能形成對國際關係上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¹的批判基礎：廉價商品同時增加了互賴理論裡各國的敏感與脆弱，但是當資源的消耗，因為廉價商品此一產業型態而加速消耗，而對能源的競逐又讓本無互信空間的主權國家更加敏感，如果廉價商品的出現意味著更互賴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那麼這個互賴是互利？還是互相分享了這個脆弱互賴體系的風險呢？更容易擴散的恐怖攻擊或黑

心商品等等，這些都是本書能夠激發我們深思的問題。

¹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y Theory)由學者柯恩(Robert Keohane)和奈伊(Joseph Nye)提出，主要論述隨著國家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多而複雜，會產生互賴關係，而這會使國家在做決策時考量及運用互賴關係，卻也使國家更容易曝露出弱點，使國家的決策複雜性上升，也因而國家間就不敢輕易發生衝突。

【《政治科學季評》招募編輯與審稿委員】

各位讀者您好，創刊至今已超過 40 期歷史的《政治科學季評》，每期皆有來自包括比較政治、公共行政、國際關係、政治哲學與思想、（歷史）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方法論……等不同領域的書評或書目稿件。著眼於《政治科學季評》是一份由師生共同組成的投稿與審稿園地，這些稿件的審查和編輯歡迎且需要您的支持與襄助。

因此，若您有興趣加入季評審稿和編輯行列的話，請至以下網址填寫資料：<http://0rz.tw/mvpSJ>。未來，我們會視投稿文章屬性與您的專長和興趣領域，安排稿件給您審查。謝謝您熱情參與。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季評專屬工作信箱：poliscireview@ntu.edu.tw，謝謝！



【政治科學季評第 41 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短篇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 截稿日期：2014 年 5 月 1 日以前。

■ 稿件筆潤：

-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 (一) 註釋及參考書目，請參考《政治科學論叢》體例。
-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 (五)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前往 <http://politics.ntu.edu.tw/?p=583#rule-3> 下載投稿表格
- (二)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

